

中国近代史

中國近代史

第七章 第一次改良主义运动——

戊戌变法

——一八九五年（光緒二十一年）至

一九〇〇年（光緒二十六年）——

第一节 緒言

中国封建統治者害怕民間使用洋机器，会产生「富农（资产阶级化的地主）大賈（民族资产阶级）」，損害傳統的封建特权。外国侵略者同样不愿把洋机器輸入中国，英国公使欧格納說，中国「机器进口，恐非西国之福也」；「今若以我英向来制造之

物，而令人皆能制造以夺我利，是自作孽也」。他认为「中国开局设厂」，将有大害于英国工业」。这些外国侵略者力图阻止中国也采用新式生产工具，以便自己壟断机器的生产力，变中国为殖民地。有的主張「机器不宜进中国」，有的主張「在中国开设厂局」，以「阻止华人开设局厂」。不管中国封建統治者和外国侵略者如何害怕与压迫，中国在一八七五年左右，已經有人将旧有的作坊，稍加扩充，采用新法制造，創立小型工厂。一八九五年以后，中国各种商办工业，又有增加。但是比起官僚买办的工业与英、美、德、

日等国凭借《馬关条約》在中国設立的工厂，力量是微弱的。以紡織业为例，据一八九六年的統計，中国境内共有紗厂十二家，四十一万七千紗錠。外商五家占有十五万八千紗錠，华商七家占有二十五万九千紗錠，华商中再除去官办紗厂的六万五千紗錠，中国商办工厂不过占紗錠总数的百分之四十六·五，如果把盛宣怀等官僚买办的資本再除去，真正中国民族资产阶級投資实在有限，因之在政治上必然表現出它的軟弱性。

李鴻章自称「圣之时」的洋务，經過甲午战争

破产了。洋务派办工业失败，给要求发展中的资本主义以机会来反对官办、官督商办，在政治上产生改良主义的民权运动。

甲午战争，中国海陆军遭受彻底的惨败，外国侵略者不仅在言论上公开主张而且在行动上积极进行「瓜分大清帝国」，这刺激了一部分满汉统治阶级及染有资本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，要求联合起来抵御外侮，在政治上产生改良主义的保种运动。

当时改良运动倡导者，如光绪帝、翁同龢、张謇、康有为、谭嗣同、梁启超等人，虽然思想上各有不同，一般

說，都是半封建半資本主義的人物。他們希望中國也走一次「明治維新」的道路，但客觀條件絕對不能允許。因為帝國主義通過洋務派與頑固派結合，確立了強大的統治機構，任何改良如果妨礙了他們，必然予以嚴厲的打擊。戊戌變法失敗的主要原因在此，戊戌以後各種改良運動無不失敗的原因也在此。

第二節 甲午戰前改良思想的醞釀

洋務派舉辦新政，自稱求富強，實際是阻遏了民間資本主義的生長。中法戰爭前後，以上海、香港為中心，有些進步的知識分子已在倡導改良主義的變法。

例如馮桂芬（林則徐的門生）著《校邠廬抗議》，主張「以中國之倫常名教為原本，輔以諸國富強之術」。所謂富強之術是「人無棄材，地無遺利，君民不隔，名實必符」四端，首先要廢除八股，開學校肄習西學，設船炮局製造洋器。實行的方法他看得極容易，說「惟皇上振刷紀綱，一轉移間耳」。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度里的資本家主要是從官僚、富商、豪紳、地主蛻變過來，他們本身缺少獨立的實力，却和封建勢力尤其是皇帝有密切的關係，把希望寄托於上層當權者。這是改良主義的共同信仰，也是它失敗的共同原因之

一。比馮桂芬更著名的王韜，曾游历英国，精通西洋科学，回国后充香港《循环日报》主笔，鼓吹变法。他赞美日本「国中一切制度，概法乎泰西」，中国急需改变「取士、练兵、学校、律例」四种旧制。更为「今日时务之急」的是「莫在乎收拾民心，因民之利而导之，顺民之志而通之」。他认为那些洋务派的新政，只「能为民祸而不能为民福，能为民害而不能为民利」（《上当路論时务书》）。王韜著书多种，对变法运动有很大影响。甲午前后，郑观应、何启、胡礼垣、陈虬等提倡变法，态度愈益显明。郑观应著《盛世危言》。

何啟著《中國亟宜改革政法論》、《新政始基》、《新政變通》、《新政安行》等書（各書多是何啟胡禮垣合著，總稱《新政真詮》）。陳虬著《治平通議》、《報國錄》（總稱《蟄戶叢書》）。都主張開議院，行君主立憲制度。鄭觀應說：「君主者權偏于上，民主者權偏于下，君民共主者權得其平。」「其立法之善，思慮之密，要皆由于上下相權，輕重得平，乃克臻此。此制既立，實合億萬人為一心矣」（《盛世危言·議院下》）。這種君主立憲主義的「主以中學（君主），輔以西學（立憲）」（《盛世危言·西學篇》）論，是

改良主义的基本精神，与洋务派专制主义的「中学为体（专制），西学为用（办洋务）」论性质有别。

国变 变法运动的别一推动力是耶稣教教士和在华

欧美商人，他们希望满清政治有某些改革，以便扩大商业推广教务，完成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目的。满清禁止中国人办报，当时通商口岸如上海、天津、汉口、香港、广州等处，西商开设报馆，延华人主笔，这些人多是维新名士，在西商庇护下独占舆论界，变法思想的传播，得力于报馆不小。一八八七年（光绪十三年）英国苏格兰长老会教士韦廉臣（A. Williamson）在上海成

立廣學會（印度也有廣學會），會員有美人林樂知（Young J. Allen）、丁韪良（W. A. P. Martin）、李佳白（Gilbert Reid）、英人慕維廉（William Muirhead）、艾約瑟（Joseph Edkins）、李提摩太（Timothy Richard）、德人化人安（Ernst Faber）等，用漢文字著書，介紹西學，改變了一部分士大夫輕視異教的成見。會中出書範圍廣泛，外國歷史及辦學校新法影響尤大。如《泰西新史攬要》（李提摩太譯）、《列國變通兴盛記》（李提摩太著，記俄國大彼得、日本明治事特詳）、《七國新學備要》（李提摩太著，又名《速興新學條例》）、《文學興國策》（林樂知譯）。

《自西徂东》（化之安著）等书给中国维新派议论变法的根据。一八八九年（光绪十五年），广学会发行《万国公报》（月报），林乐知主笔，多载时事论文及中外重大政治法令，变法成为一个运动，《万国公报》是有力的推动者。

第三节 甲午战后变法运动高涨

甲午战争中，亲俄派西太后、李鸿章压迫亲英派光绪帝、翁同龢，亲英派失败了。广学会看出亲英派不甘屈服，要在政治上寻出路，正是劝告变法的机会。一八九五年，派李提摩太驻北京，謁见政府中当权大臣。

並向光緒帝呈遞了一篇題為《新政策》的長文，大意說中國維新要實行：（一）教民之法，主要是派員出洋留學及開通士大夫知識。（二）養民之法，主要是興辦實業。（三）安民之法，主要是「暗聯有大權大德思保大局之國（指英美）以為助」，及聘用西人訓練軍隊以「保內」。（四）新民之法，主要是「借用他國之人，而派本國大臣與之合辦」。上述四條，一部分是當時維新派的常談，主要的部分是英美帝國主義滅亡中國的陰謀。這個陰謀在最後《目下中國應辦之事》條下，表現得非常露骨。他說：（一）聘二

位可信之西人，筹一良法，与天下大国立约，联交，保十年太平之局。（二）立新政部，内有总管八人，中西各半。西员可用英人某某（「英人之杰也」），美人某某（「美人之英也」）。新政应办各事，可选各国专门家分任之，均派中国大臣会办。（三）修铁路，用西人某，並請西国办铁路有名之人与之商办，中国两大臣与之合办。（四）用某总管新政部筹款借款各事，以中国管理財賦之大臣与之合办。（五）請英人某某、美人某某，随时入見皇上，以西国各事詳細奏陈。（六）国家日报請英人傅兰雅（John Freyer）美人李佳

白为总管。(七)学部用德人某某美人某某与中国大臣合办。(八)军事请专精此事之人推荐人材，以备信任。他这些办法，不是空谈而是确有准备。他要求「皇帝出示行新政」，说：「苟愿奋发图存，务于十日之内，电召此总管新政之四人入京，其余诸人，亦宜封冻以前一律赶到，盖稍迟一日，至少必自棄百万两，而丧师失地之忧，更有非意料所及者。外有俄法日本等国亦不乏能人，皆可随时延请，襄助中国，以保各国长远太平之象。」光緒帝看了这个新政策，不知是否同意，但是他的大臣翁同龢、孙家鼐（光緒帝师傅）、文

廷式（光緒帝亲信）等接受劝告，开始閱讀时务书，傾向变法。

一八八八年（光緒十四年），广东人康有为在京应順天乡試，写了一篇《上皇帝书》，請求变法維新。书中大意分「变成法、通下情、慎左右」三层，对洋务派的变法表示异議。他說：「今天下非不稍变旧法也，洋差、商局、学堂之設，开矿、公司之事，电綫、机器、輪船、鉄舰之用，不睹其利，反以藪奸。夫泰西行之而富强，中国行之而奸蠹，何哉？上体太尊而下情不达故也。」「至于奸蠹丛生，則虽良法美意，反成巨害，不如不变之为